

·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研究 ·

代际关系变迁背景下 城市中老年母亲焦虑的生成与缓解

蒋晴尔 熊跃根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在快速转型的当代中国城市生活中, 中老年母亲的焦虑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本文引入家庭主义个体化视角, 探讨中老年母亲在代际关系变迁背景下的焦虑生成机制及缓解策略。基于对 17 位城市中老年母亲开展的深度访谈发现, 中老年女性所面临的焦虑情绪, 主要源自传统家庭主义向下行式家庭主义转变过程中“夹心世代”所承受的压力, 以及个体化背景下个人主义价值观对代际关系产生的冲击。面对结构性焦虑, 她们通过代际协商重塑母职边界, 并借助技术赋能在虚拟空间中重构社交圈。中老年母亲的焦虑不应被简化为个体心理困扰, 而应被置于家庭结构转型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宏观背景之中加以理解。

关键词 中老年母亲; 代际关系; 家庭主义; 个体化

中图分类号 C91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6658(2026)01-0102-13

一、引言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 个体心理问题日益凸显, 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在人口老龄化与家庭结构剧烈变迁的双重背景下, 中老年母亲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逐渐显现。据调查, 中国现有焦虑症患者约 4000 万人, 成人终生患病率高达 7.57%^①。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的患病率上升, 与改革开放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带来的心理压力、生活方式、家庭结构变化密切相关^②。不同年龄段面临特定心理议题, 中老年人因身体衰老和家庭责任等导致的心理问题尤为突出。此外, 由于中老年人对心理问题认知的偏差与接纳的困难, 其心理问题的隐蔽性较强。因此, 揭示中老年群体的焦虑现状, 对于深入理解中国人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下中国城市社会语境中, 中老年母亲的焦虑现象逐渐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群体特征。在互联网领域, “母亲焦虑”已成为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中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在现实生活中, 越来越多的中老年女性出现心理困扰, 并前往心理门诊和情志病门诊寻求心理支持和情绪调节。在政策层面,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将“老年人健康管理”“开展老年心理健康与关怀服务”纳入国家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战略, 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家庭, 构建医养结合体系^③。

作者简介 蒋晴尔, 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社会政策、社会理论研究; 熊跃根, 男,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博士, 主要从事社会政策、比较福利体制和社会理论研究。

①HUANG Y.Q., WANG Y., WANG H., et al.,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Epidemiological Study, *The Lancet Psychiatry*, Vol.6, No.3, 2019, pp.211-224.

②任然《多角色交织困境下的中年女性焦虑》, 《中国妇女报》, 2021 年 3 月 1 日第 5 版。

③新华社《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https://www.gov.cn/zhengce/2016-10/25/content_5124174.htm, 2025.11.29。

这一政策导向说明国家层面已经认识到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促进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基于社会学的学科特点对焦虑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将个体情绪与社会转型相联系,揭示结构性与制度性矛盾。焦虑作为现代性问题,其根源可追溯至一般理论层面的探讨。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高度发展给人们的本体性安全、信任机制和自我认同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扰,从而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产生了普遍的焦虑^①。在贝克眼中,“为我自己而活”的生活方式所面临的直接后果就是自己成为失败和风险的承担者,个体的心理表征将成为社会危机的风向标^②。王天夫在对焦虑的观察中指出,尽管焦虑有其普遍性和进化根源,但焦虑不仅是个人心理问题,更是社会结构性现象,如容貌焦虑、年龄焦虑、教育焦虑等,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异化加剧了这一趋势^③。

迄今为止,关于焦虑的本土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王小章认为,在中国社会,焦虑是个体化风险社会或者说不确定性时代的一种基本社会心态^④。学者们对青年群体、农民工群体等分别做了考察,将他们的焦虑在特定的社会环境进行溯源^⑤,也通过对心理问题的社会学阐释不断认识个体背后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⑥。基于此,本研究依托在 N 市开展的田野调查,聚焦城市中老年母亲群体的焦虑现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城市中老年母亲焦虑的具体表现及其形成机制是什么?在经历焦虑的过程中,城市中老年母亲采取了哪些策略来应对焦虑?本研究将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揭示家庭结构变迁带来的“家庭主义与个体化”张力如何作用于个体的心理,进而为理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女性心理健康提供全新的分析视角。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视角

(一) 国内女性焦虑研究现状与边界

国内现有的关于女性焦虑的社会学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类围绕生育与抚育议题展开。研究发现,当前的生育焦虑是社会转型期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生育焦虑形成的关键阶段是作为生育行为起始点的备孕与怀孕时期。备孕过程中遭遇的困难或高龄生育所带来的生殖风险、个体心理层面的不确定感以及自我效能的缺失,均不断加剧女性的焦虑情绪。在新媒体普及背景下,信息的广泛传播赋予了生育焦虑独特的现代性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焦虑情绪并不会随分娩结束而终止。分娩方式选择时面临的两难境地、对分娩疼痛的恐惧、月子期间身体恢复与角色转变所产生的压力,以及家庭和社会支持的匮乏,均成为妈妈们新的焦虑源^⑦。除此之外,辅助生殖技术的不确定性也为女性带来了希望与焦虑并存的局面^⑧。

①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34页。

② [德] 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白·贝克-格恩斯海姆《个体化》,李荣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③ 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我们为什么焦虑?一个社会学家的观察》,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477359,2025.12.09。

④ 王小章《论焦虑——不确定性时代的一种基本社会心态》,《浙江学刊》,2015年第1期。

⑤ 揭其涛《当代青年“身体焦虑”的社会机制、症候呈现及其引导进路》,《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9期;李贵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性焦虑及其消解机制探讨》,《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11期;郭勤琴,柴巧霞《青年群体焦虑溯源与反思:基于互联网传播语境研究》,《传媒论坛》,2023年第16期。

⑥ ZHANG L., *Anxious China: Inner Revolution and Politics of Psychotherapy*,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0.

⑦ 冯宇,顾辉《从备孕到育儿:女性生育焦虑的生成、延续与应对》,《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5年第6期。

⑧ 余成普,李宛霖,邓明芬《希望与焦虑:辅助生殖技术中女性患者的具身体验研究》,《社会》,2019年第4期。

在育儿焦虑方面,独生子女家庭的育儿焦虑、新生代母亲的育儿焦虑和“丧偶式育儿”家庭的育儿焦虑是研究的焦点。研究发现,父母的育儿焦虑与对孩子的过分关注密切相关,而家庭规模对亲子交流的类型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在独生子女家庭,父母会更容易对孩子的状况感到紧张不安和过分敏感^①。学者们在对“丧偶式育儿”的讨论中发现,育儿社会支持的严重不足是母职困境与性别焦虑生成的土壤,有关性别秩序的刻板印象与传统观念是建构“丧偶式育儿”讨论中母职困境与性别焦虑的文化动因^②。另有学者以育龄女性在网络新媒体环境下“中年老母”的自我建构为切入点,揭示了新生代母亲(80后、90后)面临的育儿困境,即育儿过程艰难却难以放弃。她们主动或被动地认同专家话语与市场话语,既担忧孩子在早期发展中“输在起跑线”,又忧虑孩子在教育的层层选拔中被淘汰,更惧怕孩子因学业累积劣势在未来就业市场中处于边缘地位。作为育儿的“社会终端”,她们期望精准把控孩子学业进程的每一个环节,然而其母职负担已然超出负荷^③。在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教育母职化现象成为母职焦虑的重要成因^④。

学者们所观察到的第二类女性焦虑源自家庭角色与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学术妈妈”群体^⑤为例,她们在探寻工作—家庭平衡的实践进程中陷入困境,进而体会到三重焦虑:其一,在母职与教职的双重角色实践过程中的时间焦虑;其二,在竭力达成完美“学术妈妈”社会预期却遭受挫折后的身份焦虑;其三,在学术劳动和育儿劳动的双重异化状态下的价值焦虑。学者们剖析了这一特殊群体如何既面临职场母亲普遍存在的工作—家庭冲突,又承受因学术职业的独特性所引发的隐性母职惩罚^⑥。

最后,“容貌焦虑”是当前社会困扰青年女性群体的重要社会心态问题。研究发现,青年女性产生“容貌焦虑”的社会因素关联了构建亲密关系与寻求社会认同的双重维度。信息网络媒介的发展虽为女性拓展了更为广阔自我呈现空间,却也助推了社会审美文化与消费社会文化的渗透;加之媒介对单一身体形象标准的刻意强化,以及对身体消费的持续诱导,最终使广大青年女性深陷“社会审美—容貌焦虑—身体消费”的恶性循环之中^⑦。大众媒介建构的单一审美场域、消费文化背景下女性外貌的商品化等因素共同催生了青年女性的容貌焦虑^⑧。

综合上述三类研究可以发现,国内有关女性焦虑的讨论大多围绕育龄阶段的性别角色冲突展开,隐含着一个共同的前提:焦虑主要源于“生”“育”“工”三重压力,即生育责任、育儿竞争下的母职压力以及家庭与职场之间的角色失衡。在这一框架中,女性焦虑被视为以母职与身体为中心的生命历程前期问题。然而,当女性步入中老年后,“生”“育”的直接责任逐渐淡出,容貌规训也不再是焦虑的主要来源,但她们的焦虑却不减反增。换言之,目前的研究结论难以解释:为何在母职退出与角色松动后,焦虑依然存在?这一现象提示我们:中老年母亲的焦虑或许与青年及育龄女性有着不同的生成逻辑,但与上述群体一样深深嵌入家庭结构与生活事件中。基于此,有必要将研

①桑标《父母意识·育儿焦虑·先天气质——独生子女与亲子关系研究的新热点》,《当代青年研究》,1998年第2期。

②郭戈《“丧偶式育儿”话语中的母职困境与性别焦虑》,《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③魏杰,桑志芹《新生代母亲的抚育困境与育儿焦虑——基于新媒体“中年老母”群体的社会心理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10期。

④杨笛,金一虹《教育母职化与母职的焦虑》,《社会建设》,2022年第1期。

⑤即年龄在40周岁以下、已生育的高校女性教师。

⑥李胜蓝《夹缝中的母职实践“学术妈妈”的焦虑体验及缓解策略》,《青年研究》,2025年第5期。

⑦李升,李敏《当代青年女性“容貌焦虑”的社会机制分析》,《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4期。

⑧刘燕《审美与自我呈现:青年女性容貌焦虑的深层逻辑》,《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5期。

究视角从生育压力与性别规训转移至中老年母亲所处的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中,从而回应中老年母亲情绪体验的独特性。下文将以中国及东亚其他国家学者的研究为例,为中国城市中老年女性焦虑问题的研究提供借鉴。

(二) 东亚女性焦虑研究的家庭视角

东亚学者已经开始尝试从家庭变迁中溯源个体心理问题的症结。落合惠美子曾在著作《21 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中谈到了女性的“思秋期”和“育儿焦虑症”问题,揭示情绪和心理问题的表征背后是“少子化”和“主妇化”这两个战后日本家庭的发展趋势^①。斋藤茂男在《妻子们的思秋期》中,记录了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主妇在承担家务劳动、维系家庭生活的过程中付出的大量情绪劳动,并指出,若家庭成员无法对其价值进行合理评估并予以尊重,则可能出现家庭内部的情绪剥削现象^②。一项国际社会调查揭示,韩国中老年女性已成为“全球最不幸福”的群体。对此,张庆燮将韩国家庭亲代与子代的个人生命历程变化、家庭生命周期变迁与韩国社会压缩现代性的发展过程相结合,发现了韩国中老年女性“不幸福感”的根源在于家庭结构的变迁、社会规范的冲突、经济负担的持续以及文化角色与自主性的丧失^③。随着年轻一代对中老年父母依赖的增强,“主干家庭”被“反向主干家庭”取代。中老年母亲无法享受晚年安逸独立的生活,需持续参与子女生活管理。传统社会中,父母对子女重大事项有权威,如今权威的消失使得中老年母亲失去传统家庭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与价值感。

近年来,国内已经有学者运用“家庭病理学”重新定位个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安孟竹在研究孤独症儿童的家庭治疗时,揭示了“治疗家庭”对“治疗儿童”的积极影响。重新审视“家”的含义,对孤独症儿童的父母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家庭治疗为孤独症儿童的家庭提供了一种在亲密关系中重新定位个体痛苦的视角。其中,孩子“症状”的显现有助于透视更深层次的关系问题,解开不良的互动模式,这正是“家庭病理学”概念的起源^④。

(三) “家庭主义”与“个体化”之间的中老年女性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发现,与心理学家讨论的“焦虑”不同,社会学家更侧重于关注作为一种群体心理现象的“焦虑”,并解读背后的时代特点^⑤。现有女性焦虑研究主要建立于青年与育龄阶段的性别角色冲突之上,与这一年龄阶段女性身处新媒体和消费主义环境而产生的身体规训与教育内卷背景下的密集母职压力密切相关。然而,这一分析框架难以解释:当女性退出直接育儿职责后,为何城市中老年母亲的焦虑仍持续存在,甚至进一步加剧?东亚的实证研究揭示出中老年女性焦虑经验往往与家庭结构变迁及代际关系调整密切相关,这提示我们“家庭”应被视为理解中老年母亲焦虑的重要情境。

在研究中国家庭转型的过程中,阎云翔等人开始运用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个体化命题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与家庭,特别是将“个体化”与“家庭主义”作为分析中国家庭关系变迁的核心概念工具^⑥。中国的个体化确实呈现出与西欧类似的特征,如传统规范的松动、个体自主性的提升

① [日] 落合惠美子《21 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第 3 版),郑杨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

② [日] 斋藤茂男《妻子们的思秋期》,高璐璐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

③ KYUNG-SUP C., *The Logic of Compressed Modernity*, Cambridge & Medford: Polity Press, 2022.

④ 安孟竹《从“治疗孩子”到“治疗家庭”:家庭治疗在孤独症谱系家庭中的性别化实践》,《妇女研究论丛》,2024 年第 2 期。

⑤ 周晓虹《焦虑:迅疾变迁背景下的时代症候》,《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 年第 6 期。

⑥ 沈毅,桂音希《家庭主义与个体化之间“新家庭主义”脉络下的代际关系变迁研究与展望》,《浙江社会科学》,2025 年第 4 期。

与自我实现路径的拓展^①,然而与西欧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并未伴随家庭功能的退化,市场化与风险社会环境反而强化了家庭作为托底资源供给者的角色^②,也就是说,中国的个体化在本质上是与家庭主义勾连在一起的。

在这一背景下,阎云翔提出“新家庭主义”的概念来概括个体将家庭主义作为主要策略,通过多代家庭群体的集体努力来追求个人幸福和家庭繁荣的新兴家庭意识形态^③。然而,有学者指出,新家庭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一并囊括了目前中国家庭存在的这些价值观的内在矛盾,仍旧力图在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的对立中发现新的融合可能,这并不利于对不同现象和关键趋势进行比较研究和深化分析。事实上,当下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已明显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种带有浓厚家庭主义色彩的早期个体化,以“为自己而活”为导向的个体主义意识抬头,使个体化与家庭主义之间形成了愈发尖锐的张力^④。对这一问题的再思考,也与中老年群体密切相关——原本被视为个体化被动承受者的亲代,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展现出对自由与自主生活方式的主动追求,呈现出在主观意识与客观实践两个层面上的“双重个体化”^⑤。

在中国家庭从家庭主义走向个体化的过程中,代际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确实存在极端自我主义的可能,这种倾向对以“父慈子孝”为核心的传统孝道与代际互哺模式构成了冲击;另一方面,亲代在价值层面仍将深度情感涉入和互助互惠视为家庭主义的伦理要求,从而在观念上排斥用“社会交换”的个体主义思维看待亲子关系^⑥。当子代在实践中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导向,不仅不尽赡养义务,反而在经济和劳务方面持续向亲代索取时,也就导致了贺雪峰在“代际剥削”视角下所揭示的严重失衡的农村家庭代际关系^⑦;在城市家庭语境中,这一现象则常被概括为“啃老”^⑧。在“个体化2.0”时代,暴露在不确定风险之下的个体重新寻求家庭嵌入,以家庭支持来规避风险,但这种“有控制的回归”既非传统家庭的简单复辟,也带来了新的不平等与矛盾:家庭共同体性质得以延续,家庭资源的代际互补与互惠更加突出,但资源流动方向发生了逆转,代际关系呈现出“疏离又亲密”的复杂状态^⑨。

将当下中国城市家庭的变迁置于家庭主义与个体化的视角下,能够初步洞察到作为亲代的中老年女性在家庭内部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一方面,她们所表征的是家庭主义视角下的传统角色;另一方面,亲密关系另一端的子代受到了个体化背景下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那么,她们如何在这种亲子关系中体验焦虑并形成相应的应对策略?本文认为,若要将中老年母亲的焦虑体验与她们

①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41—342页。

②陈映芳《社会生活正常化:历史转折中的“家庭化”》,《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5期。

③YAN Y.X., “Introduction: The Inverted Family, Post-Patriarchal Intergenerationality and Neo-Familism,” in *Chinese Families Upside Down: Intergenerational Dynamics and Neo-Familis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YUNXIANG YAN (ed.),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 2021, pp.1-30.

④沈毅,桂音希《家庭主义与个体化之间“新家庭主义”脉络下的代际关系变迁研究与展望》,《浙江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

⑤杨君《关系型家庭:城市中老年家庭的生活特征与个体化悖论》,《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沈毅,乔思羽《城市老年人的“个体化”进程与代际责任选择——基于隔代抚养的案例比较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

⑥沈毅《亲密关系:伦理需求抑或社会交换——基于中西文化差异的比较分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4年第3期。

⑦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

⑧刘汶蓉《转型期的家庭代际情感与团结——基于上海两类“啃老”家庭的比较》,《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

⑨孙悦《脱嵌与再嵌:个体化视角下的中国家庭变迁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5年第3期。

所处的家庭环境建立关联，“家庭主义—个体化”的理论视角具备合理性与解释力。下文将结合具体访谈资料，探究中老年母亲的焦虑在家庭转型与代际关系变迁进程中是如何被催生和缓解的。

三、城市中老年母亲的群体画像与日常生活

(一) 城市中老年母亲的群体画像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受访者，重点关注具有持续显著焦虑经验^①的城市中老年母亲。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研究并非以“焦虑症患者”为研究对象，而是以在日常生活中反复感受到焦虑并主动寻求支持或表达情绪困扰的女性为主要观察主体，即关注其焦虑的社会性生成机制而非临床病理特征。在确立样本来源方面，研究者首先进入 N 市某医院的心理门诊与情志病科室开展线下接触，以获取因焦虑情绪寻求医疗支持的女性群体；同时，通过小红书互助帖等在数字社交空间邀请受访者，以纳入未就医但自述具有焦虑经历的母亲，从而提升样本的多样性。受访者限定为年龄 45~65 岁的城市母亲。此年龄阶段既涉及更年期等身体变化，也包含家庭结构与角色定位的显著转折，因此普遍被视为情绪与心理研究的重要生命历程阶段^②。

研究的经验材料收集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方法。最终对 17 位受访者进行了访谈，访谈围绕四个主题展开，分别为：焦虑经验与来源、家庭关系变化、应对策略和社会支持状况。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长约为 60~90 分钟。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受访者基本情况

化名	年龄	性别	工作状态	生育状况	主要焦虑源	焦虑症状及持续时间
LR	63	女	退休	育有一女	中间一代；女儿的感情不稳定与叛逆	失眠、胸闷气短(已持续一年)
WL	53	女	国企在职	育有一女	中间一代；女儿的工作及感情不稳定	失眠、心烦、脾气暴躁(已持续两年)
NH	52	女	个体经营	育有一女	女儿的学业不稳定与叛逆	失眠、易怒(已持续一年)
DM	65	女	退休	育有两女	中间一代；女儿的婚姻不稳定	失眠、容易受惊吓(已持续一年)
NW	45	女	家庭主妇	育有两子	大儿子中考；小儿子遭遇“双减”	头痛、胸闷、易怒(已持续半年)
HD	46	女	私企在职	育有一子	儿子休学在家	容易情绪崩溃、大哭(已持续一年)
DN	54	女	事业单位在职	育有一女	女儿的事业、感情不稳定与叛逆	紧张、失眠、易怒(已持续三年)

①焦虑在本文中指代个体在社会结构性压力与不确定性情境下持续感受到的紧张、担忧与失控感。
②KISKAC N., RASHIDI M., KISKAC M., Determination of Aging Anxiety in Middle-aged Women, *Revista da Associação Médica Brasileira*, Vol.70, No.3, 2024.

续表

化名	年龄	性别	工作状态	生育状况	主要焦虑源	焦虑症状及持续时间
HM	52	女	家庭主妇	育有一女	母亲的养老问题及与母亲的矛盾	情绪低落、食欲减退(已持续半年)
NJ	50	女	国企在职	育有一女	女儿的学业不稳定与叛逆	过度担心、恐惧(已持续半年)
ZL	48	女	事业单位在职	育有一子	儿子的学业不稳定	长期处于难以放松的状态,易激惹、烦躁(已持续一年)
ZD	46	女	私企在职	育有一子	“双减”后儿子学习压力大	易怒、月经紊乱(已持续一年)
GS	54	女	退休	育有一子一女	儿子休学在家	头晕、乏力、血压波动(已持续一年)
JH	58	女	退休	育有两女	自身的健康状况不佳	胸闷透不过气、会突然感觉到无力(自2018年起)
SW	50	女	公务员在职	育有一子	儿子的学业不稳定及叛逆	紧张不安、情绪低落(已持续三个月)
ZS	45	女	事业单位在职	育有一女	女儿的学业不稳定与叛逆	失眠、紧张不安(已持续半年)
YP	65	女	退休	育有一女	女儿还未结婚	心烦、情绪低落、紧张(已持续半年)
MF	45	女	家庭主妇	育有两子	儿子的学业压力	易怒、记忆力减退(已持续半年)

总体而言,以本研究受访者为代表的城市中老年母亲群体有如下特征:其一,在生命历程上均处于中年后期与退休起始阶段,在这一阶段,多数人需要面对家庭角色的转折与生理状态的变化;其二,这一群体在家庭结构上普遍承担对上一代与子代的双向照料责任,呈现典型的城市“夹心代”特征;其三,她们成长于计划经济时代,但育儿与养老行为发生在市场化和教育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多种价值观在人生的中晚年阶段产生叠加。以上特征共同构成城市中老年母亲的基本画像,也为后续焦虑情绪的呈现与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二) 中老年母亲的日常生活

当下,城市中老年母亲的日常生活状态究竟如何?以本研究所访谈的17位城市中老年母亲为例,我们发现,“孩子”始终是她们日常生活中频繁提及的话题。受访者中,第一类是三位60多岁且已退休的母亲,她们无需应对职场与家庭平衡的压力,且子女均已成年并参加工作。然而,她们并未如预期般享受闲适的退休生活,她们中有人仍在从事兼职工作,有人深受子女婚姻问题的困扰。第二类是尚未退休的50多岁的母亲,她们每日疲于奔命,难以兼顾年迈的父母、工作以及仍需支持的子女,在生活中无暇顾及自身。尽管她们的子女尚未步入婚姻和职场,但在择业和择偶方面已有自己的主见。因此,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她们还需要和子女“斗智斗勇”。第三类母亲刚刚进入更

年期,作为晚育或二胎母亲,她们仍承受着母职压力。然而,生理机能的衰退使她们在应对孩子的“双减”教育时倍感困扰与焦虑。综上所述,在城市中老年母亲的日常生活中,代际压力和代际矛盾屡见不鲜。

这进一步凸显了中老年母亲焦虑议题的独特性。对于家庭中的女性而言,生育和抚育并非引发焦虑的唯一因素。在其生命历程的中晚期,代际矛盾和代际压力成为生活的主题,甚至给她们带来心理困扰。因此,下文将通过个案呈现的方式,探究城市中老年母亲的焦虑生成机制和缓解焦虑的能动性实践。

四、城市中老年母亲的焦虑生成过程

(一)“夹心一代”的压力“孝道”与“恩往下流”

在当下的中国城市家庭中,中老年母亲是家庭中的“夹心世代”。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工作学者 Dorothy Miller 提出,初指同时面临父母和子女获取代际资源需求的家庭成员^①。老年人的成年子女被裹挟在年迈的父母和自己成熟的孩子之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中国传统家庭主义以“父权”和“孝道”为主,周飞舟认为,在传统家庭主义的内核之中,与强制性的“父权”相比较,“孝道”所凸显的是某种角色规范的自觉顺从,其背后的运作逻辑还是“父慈子孝”以至于“慈孝一体”的双向义务责任的伦理原则^②。因此,受传统家庭主义观念影响的中老年母亲,自然将赡养年迈老人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然而,受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她们难以从子女身上获取“反哺”,反而倾向于“恩往下流”,即向自己的子女投入更多资源并给予更多关注,也就是倾向于牺牲自身利益,以保障子女和孙辈能够获得更优渥的生活条件和更多的发展机会^③。这也与阎云翔提出的“下行式家庭主义”(descending familism)类似,它指的是家庭中的资源和关注向下流动,即从父母流向子女和孙辈^④。因此,中老年母亲既需要向其父母履行赡养义务,又需要向其子女提供代际支持,而这份代际支持也会伴随着子代在个体化影响下选择的不确定生活方式而不断延长。

65 岁的 DM 便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她出生在农村,但居住在 N 市郊区,退休前在某工厂食堂工作。按理说,DM 应当在退休后享受安逸的晚年时光,但她却常常像一个“陀螺”,不断往返于临时工作地点、女儿家和父母家之间。回到家后,她还继续做着手工活,制作简易塑料玩具以补贴家用。尽管这些重复的工作在她看来能帮助她打发“空闲”时间,然而她的生活实则并没有她想象的安逸。自两年前起,DM 开始呈现焦虑状态,具体症状表现为失眠、情绪低落以及易受惊吓等。其焦虑情绪源于父亲入院与女儿婚变这两个事件。彼时,老父亲因病住院,DM 白天需对老人进行照料,夜晚还会接到女儿与女婿争吵的电话。当焦虑程度较为严重时,半夜的任何消息与电话都会使她产生强烈的惊恐反应。自女儿离婚后,DM 认为自己应该承担起供养女儿的责任,她想要尽全力为女儿的单身生活留下足够的物质保障。她甚至开始计划为离婚后的女儿在城市购置一套房产,以确保其生活的稳定,这无疑给自己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于是,她开始在家附近工地的食

① MILLER D.A., The “Sandwich” Generation: Adult Children of the Aging, *Social Work*, Vol.26, No.5, 1981, pp.419-423.

② 周飞舟《慈孝一体:论差序格局的“核心层”》,《学海》,2019 年第 2 期。

③ 狄金华,郑丹丹《伦理论丧抑或是伦理转向: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社会》,2016 年第 1 期。

④ 阎云翔,杨雯琦《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探索与争鸣》,2017 年第 7 期。

堂工作,希望通过从事多份兼职来实现这一目标。她的一天通常始于清晨,先去父母住处探望长辈,为其购置食材,随后到食堂上班,晚上则会与女儿视频通话,以确认孩子的状况是否良好。每天与女儿视频时,她格外关注女儿的情绪状态,只有当看到女儿状态有所改善时,她的担忧和焦虑才会稍有缓解。

本研究的部分受访者受到了延迟退休政策的影响,她们不仅要平衡家中“一老一小”的需求,还需兼顾工作。以 WL 为例,她就职于一家国有银行,按照原规定,她在 50 岁时便可办理退休手续,但由于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她仍需在工作岗位上持续工作至 55 岁。她对此颇为不满,认为自己工作任务繁重,薪资微薄,期望能够尽早退休。更大的困扰是她背后的老人与孩子,WL 的父亲患有帕金森病,入住了养老院,母亲行动不便,WL 与其姐姐只能分工照顾父母。然而,老父亲不愿住在养老院,常找各种理由让女儿们陪他回家,但家庭护理所需的高额费用是姐妹俩难以承受的。她每年仅有 15 天年假,每次仅能请假半天陪同父亲前往医院检查,一年之中,她探望父亲的次数最多有 30 次。每逢周末,她既要去养老院看望父亲,又要回老家照顾母亲。她的压力不止于此:女儿目前在境外攻读研究生,学费和房租也是压在她心头的负担。而她的焦虑也不只源于在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分身乏术,更源于女儿婉拒了她的“恩往下流”——她拒绝了母亲千辛万苦为她安排的稳定工作,而是打算在外地创业。

“我真的很累,我的白发越来越多,(头发)现在都是染的。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会想到女儿,她要怎么办啊。”

自两年前父亲因为疾病而丧失行动能力开始,WL 就受到焦虑困扰,经常失眠。近期,女儿临近毕业,求职遇阻,她更是开始操心女儿的未来生活。而这份担忧,变成了她对自己的苛刻,女儿不在家时,她和丈夫过着十分节俭的生活。夫妻二人很少去菜场买菜,她们将攒下的钱用于为女儿购置保险,以保障其即使在不佳的就业形势下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也能在未来拥有稳定的生活。

伴随二孩政策的推行,部分母亲体验到了来自“4—2—2”家庭的“夹心世代”压力。有研究者指出,这一群体需要应对被照顾者的脆弱性、情感资源的短缺、社会教育焦虑以及家庭生计压力^①。在受访者中,有两位刚过 45 岁的母亲均在情志病门诊问诊,都称自己感到焦虑、脾气暴躁,同时还感觉精力不济。通过对这两位母亲进行访谈获知,她们都是二胎妈妈,且均为全职家庭主妇。NW 的大儿子正面临中考,小儿子刚上小学,遇到了“双减”政策实施。现在,她既要关注大儿子的备考情况,又要在小儿子“双减”后承担更多的家庭辅导工作。其焦虑表现为易怒与头疼,她的丈夫也察觉到了她的异常。对此,她也认识到经常向孩子发火是不妥的,但难以控制自身情绪。而另一位母亲 MF 同样需要处理两个孩子的学业问题,不过令她更为担忧的是记忆力的下降,她怕自己未老先衰,无法像年轻时那样为孩子的成长投入充沛的精力。

(二) 代际关系危机 “为自己而活”与“无公德的个人”

随着子代受到个体化新形势下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其与亲代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愈发激烈,此类摩擦乃至“冷战”已然成为中老年母亲焦虑的重要诱因。阎云翔曾指出,逼婚、催生、不婚不育等社会现象均体现了个人主义与传统家庭主义之间的博弈^②。在本研究的受访者中,此类博弈并非

^①WU J.,TIAN B.,GAO Y.,et al.,Extinguishing the Fire at Both Ends:The Dual Family-Caregiving Stress of the Sandwich Generation of China's "4-2-2" Families,*Families in Societ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ervices*,Vol.105, No.4,2023,pp.604-620.

^②YAN Y.X.,Neo-Familism and the State in Contemporary China,*Urban Anthropology and Studies of Cultural Systems and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Vol.47,No.3/4,2018,pp.181-224.

仅存在于婚恋领域,学习以及择业等方面同样是两代人易产生分歧之处。部分年轻人试图选择“为自我而活”的人生道路,这引发了母亲的担忧;在更为严峻的亲子矛盾中,甚至呈现出了“无公德的个人”之态势,印证了阎云翔所说的,在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中存在着极端自我主义的可能性^①,而这恰恰又对家庭主义的代际关系,尤其是传统孝道构成了冲击。

NJ 目前在一家国有企业担任高管,事业上小有成就的她却连连在女儿身上感受到了挫败。她的焦虑开始于女儿高中阶段的学习,当时,她将孩子送往国内数一数二的国际高中,希望女儿能够在更广阔的舞台上接受国际化教育,从而进入世界名校。然而事与愿违,女儿不仅未能达到她期望的学业水平,反而沉迷于街舞,接连旷课,最终只进入了一所普通的海外高校。长期以来,NJ 试图在其女儿面前展现出温和妥协的姿态,但没能改变女儿桀骜的个性,直到她再次发现女儿逃课的情况,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前段时间,你知道吗?有一次我跟她视频时,发现她不在学校。我问她,她说‘妈妈,我本来想等你来这里再跟你商量一件事’。然后她告诉我,她已经一个月没去上学了。如果是几年前,我肯定会马上爆炸,但这次我冷静下来,问她为什么不去上学。她说,等我去后再告诉我。于是,我飞到澳大利亚待了半个月,最终她告诉我,她不想学商科了,觉得没意思。我问她那她想学什么,她说她想学哲学。如果她改专业,所有的学分都得重修。”在女儿假期回家后,NJ 与她进行了几次交谈,听到了一些让她无法接受的话语:

“她告诉我,她首先是她自己,然后才是我的女儿。她可能不会结婚,也不会生孩子,叫我不用管她,她要过属于自己的生活。”

尽管 NJ 在表面上支持女儿带有极度不确定性的生活方式,但她的内心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包括女儿转专业、找工作、择偶等在内的各方面的担忧。对她而言,这样持续的焦虑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

而在其他的案例中,代际冲突带来的“冷战”使母女二人都深陷焦虑。在对 DN 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她的女儿毕业后顺利入职当地的一家银行,工作稳定且薪水可观。然而,她女儿今年突然决定辞去银行工作,开始从事此前从未接触过的烘焙行业。对于女儿丢弃铁饭碗,转而成为个体户的行为,她十分不解。此外,DN 对女儿所交往的外地男朋友也十分不认可。在几次争吵之后,女儿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如今,只有她丈夫和女儿保持着正常的联系,母女之间的“冷战”让两人都深感煎熬,却又无法破冰。

婚恋亦是亲子关系中价值观博弈最为激烈的议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 YP 的经历。YP 的丈夫早年因病去世,她含辛茹苦地独自把女儿抚养长大,并将女儿送上了教师岗位。但女儿却在相亲中屡屡不顺,今年已经 34 岁的女儿对母亲坦言,自己已经打算结婚。而 YP 在前不久的体检中被发现有心肌缺血的情况,当时她因为这一诊断十分焦虑,整宿失眠,在 10 天的时间里瘦了 5 斤,直至后来的检查发现并无大碍,她才放下悬着的心:

“我是担心女儿。如果我走了,她又没有自己的家庭,那她就一个人,我想起这个就难受,所以我很害怕自己出什么事。”

对于这份期盼,女儿并没有给出回应。过年前的一天,两人再次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争吵,而这一次,女儿坚持不婚的理由使她无力辩驳。

^①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版。

“她那天跟我吵架,她说她不想走进婚姻,是因为不想走我的老路,这件事情其实让我很难受。(我)辛辛苦苦把她养大,她却觉得作为一个女人,像我一样为孩子付出了一切,很命苦,所以她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因为有了孩子就要为孩子付出自己。她真的很自私。”

用自私来形容自己孩子的不仅仅是 YP,还有 LR。LR 是受访者中确诊焦虑症的一位,严重的时候需要服用药物才能稳定情绪。对于她而言,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情宛如一场噩梦,给她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跟你讲,我现在倒想最好没有孩子,我不受这个苦。我活(了)60多岁,(感觉)今年是最不容易的一年,(与之相比)其他所有的坎坷都不算事,我都能克服。没钱、领导欺压,那算得啥呀?它真正能够伤到我吗?伤到我不想活了吗?伤不到,只有你的孩子能伤到你。”

LR 早年于事业单位从事创作类工作,当其凭借自身努力为女儿在省城购置房产,圆满达成对女儿的最后一项“托举”任务时,却收到了来自女儿的“告知书”。经访谈了解到,LR 的女儿在经历了工作与感情上的挫折之后,拒绝了母亲对自己的“情感依赖”,她认为母亲时常以自己的“牺牲”为由干涉她的生活,并以身体不佳为借口取得她的关心,这一系列行为使她抱有很大的心理负担,她的生活也受到了母亲过分干涉带来的不良影响。因此,她希望母亲和自己有明确的边界,过好自己的生活,不要以爱的名义对她进行道德绑架。这一“协议”让 LR 陷入了情绪低谷,她一边为女儿的工作与婚姻变动焦虑,一边又因女儿要和其划清界限而痛苦。对 LR 而言,最难以承受的情况在于,其女儿在物质维度依赖她的供给,却试图在情感层面维持独立,呈现出了享有权利却不履行义务、拥有自由却不承担责任的状态。

五、焦虑的缓解:有限母职与社交重建

通过对上述城市中老年母亲焦虑经历的呈现可知,“夹心世代”的压力以及个体主义价值观冲击下的代际冲突,是其焦虑形成的主要机制。尽管部分母亲的行为体现出传统家庭主义在个体化新形势下,面对个体主义价值观日益凸显所作出的逐步妥协与改变,但她们并非完全处于被动承受的地位。诸多成功缓解焦虑的中老年母亲,以其亲身经历向我们揭示:在个体化潮流的冲击下,实现自我调适的关键在于向“有限母职”转变,并在社交媒体寻求社群支持、重建社交生活。

(一) 从“牺牲型母职”到“有限母职”

以 NJ 为例,她曾因与女儿在学业上的分歧而感到焦虑。在与女儿逐步推进的交流中,她认识到不能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女儿的生活,她将与女儿磨合的过程称为“人到中年的学习”。

“跟女儿在一起,我觉得我在成长,我的思想观念在跟她的交流中接受她给我带来的那些新想法。虽然我现在也已经50多岁了,但我感觉不得不学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去接受它。”

对于女儿转专业的想法,她并没有直接反对,而是告诉女儿利弊,希望她能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起责任。尽管 NJ 尝试在女儿身上学习并理解年轻人个体化的生活取向,但这对她来说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女儿带来的“不确定性”,她需要一些时间去接纳。

WL 也在与女儿的多次争执后发现,强硬的批评和过分干涉孩子的情感生活只会将孩子越推越远。她决定改变以前的强势角色,减少对女儿生活的干涉,只在其愿意的时候进行沟通。

“所以我对(待)她的方法真的是要换的,我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她回来,不管她有没有男朋友,哪怕不结婚,一个人过生活,我也能接受。”

但与此同时,WL也做好了女儿继续在外地生活的准备,这一次她决定放手。她表示在女儿毕业后不会再给女儿生活费,女儿必须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而她也要攒下钱来为自己的养老做准备,伴随着物质付出的减少,她希望可以放下对孩子的期待,过好自己剩下的人生。

GS在面对儿子辍学的困境时会感到束手无策。但现在她不再干预儿子的个人生活,而是开始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如园艺、十字绣等。在访谈中,GS提到了一个很小的细节,体现了她如何向有限母职转变:

“以前我都会监督他洗澡,有时候我说‘你臭得很,可以洗了’,他说他又不脏,我要嫌他脏,就不要进房间。但是现在的话,他自己有意识了,他还会自己洗内衣、内裤这些。有时候把我的东西也顺手洗了。这种事情很简单,但是让我心里非常开心。”

当她尝试与儿子保持适度的互动边界时,儿子开始主动减少防备,这让她感到宽慰。对于孩子的未来,GS表示将全力支持,比起儿子的成功或失败,她当前更在意的是实现与儿子之间的代际和解,恢复往昔的和谐生活。

(二) 技术赋能: 在虚拟空间中重建社交

对城市中老年母亲而言,线上社群不仅是获取信息的平台,更是修复情感与生产意义的场域。在面对代际互动失序时,中老年母亲常会体验到焦虑情绪。为应对这一问题,她们不仅在家庭内部尝试母职的转变,也会选择加入线上互助小组。例如,GS通过小红书平台结识了经历相似的母亲们,其中一位母亲的建议对她产生了深刻影响。

“现在等于把孩子再重养一遍,你就把他当成一个三岁小孩,咱们小猫小狗也可以养,最起码他比小猫好养吧。”她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劝我,我慢慢也就放下了、能接纳了。”

通过这种劝导,GS逐渐放下了焦虑,开始接纳现状。随后,GS也积极在小红书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感受,并在微信朋友圈和抖音上展示自己养的花卉,与朋友们进行互动。在虚拟空间中,这些经历相似的母亲们相互支持,共同为母职转型和应对生活挑战出谋划策,从而为这段艰难时期赋予了新的意义。随着虚拟空间成为生活中的另一个支撑点,GS自然而然地减少了对孩子的过度关注,从焦虑状态中解脱了出来。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城市中老年母亲群体开拓了新的社交生活,切实缓解了她们在代际互动中体验到的失落感。以上文提到的YP为例,其女儿拒绝步入婚姻,致使她的“外婆梦”破灭,而此时她的同龄人已开始承担起抚养第三代的责任。在女儿工作期间,独自在家的YP的主要活动是上网,尤其是通过观看短视频来打发时间,并借此与外界保持联系。她偶尔会通过微信电话和视频与好友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她的孤独与焦虑。

六、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本研究基于“家庭主义—个体化”的理论视角,剖析了城市中老年母亲在代际关系变迁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焦虑体验。研究显示,城市中老年母亲的焦虑情绪深深嵌入家庭结构变迁的进程之中。焦虑是她们在传统家庭主义尚未退场,且个体化背景下个人主义价值观加速发展这一结构情境下所产生的心理困扰。首先,作为当下城市家庭中的“夹心世代”,她们也经历着传统家庭向下行式家

庭的转变,因此她们既对上承担着赡养义务,又需要“托举”下一代,这使她们在生命历程中后段依然处于高压之下,焦虑因此累积并长期化。其次,无论是个体化观念中的“为自己而活”,还是极端自我主义下的“无公德的个人”,都给传统的代际关系带来了冲击,由代际冲突引发的亲子关系恶化与对子代不确定性生活方式的过度担忧是中老年母亲焦虑的诱因。然而,部分中老年母亲通过与子代开展代际协商,主动从子代处汲取个体化观念,重新划定亲子关系的边界,转变为“有限母职”模式,抑或借助线上互助途径,寻求社会支持,拓展线上社交范围,这些能动性实践是缓解其焦虑情绪的有效策略。

(二) 讨论

本研究为中老年女性心理健康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并揭示了应对城市中老年母亲焦虑问题的政策方向。从“家庭主义—个体化”的研究视角切入,本研究用城市中老年母亲的焦虑事实呈现了此前学者所提到的个体化与家庭主义之间形成的愈发尖锐的张力,并分析了这样的张力如何作用于个体的生活并引发心理危机,也从焦虑的缓解策略印证了学者提到的中老年人追求自我生活的可能性,尽管这种观念的改变是在受个体化思潮冲击的被动情形下所形成的。从现实维度来看,本研究通过剖析城市中老年母亲的焦虑状况,发现当前部分城市家庭已难以独自承担高强度照护责任。当老龄化加剧时,传统的“家庭兜底”抗风险模式正在面临极大挑战。将照护压力集中于中间一代,不仅会加重其情绪困境,还可能导致代际关系紧张。因此,亟须在制度与社会支持体系层面进行完善。应完善照护服务体系,通过提升公共养老与托育供给来减轻家庭照料压力,并通过数字技术普及与社会参与渠道拓展,使中老年母亲在家庭之外获得更多自我发展空间与主体性重建的机会。

Formation and Alleviation of Anxiety among Urban Middle-aged and Elderly Mothers ami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ormation

JIANG Qing-er XIONG Yue-ge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rapidly transforming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anxiety among middle-aged and older mothers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widespread social phenomenon. Adopting a familism-individualizatio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such anxiety is produced and the strategies through which it is alleviated amid changing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7 urban middle-aged and elderly mother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ir anxiety primarily stems from two intertwined forces: the “sandwich-generation” burden emerging from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familism to downward-oriented familism, and the disrup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ethics caused by the rise of individualistic values. In response to this structural anxiety, these women renegotiate maternal boundaries through intergenerational negotiation and rebuild their social networks in virtual spaces by leveraging digital technology. The anxiety experienced by middle-aged and elderly mothers should not be reduced to an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distress, but rather understood within the broader macro-context of family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ocultural change.

Key words: middle-aged and elderly mother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familism; individualization

(责任编辑 李特帆)

学者简介



熊跃根，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3月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并获哲学博士学位。1998年7月至2000年6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并承担教学工作。自2000年7月起，任职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并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02年11月至2003年8月，在牛津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担任“英国学术院王宽诚访问学者”；2010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般项目、重点项目与重大项目。主要从事社会政策、福利体制比较与社会理论研究。

李伟峰，济南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性别社会学、福利社会学、人口社会学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获评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专家、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山东省社会工作专家，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计划”科研团队负责人，兼任中国社会学学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山东省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含1项重点），教育部、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等省部级科研项目15项。在《人口研究》《人口与发展》《妇女研究论丛》《民俗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

余篇，其中5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出版专著1部。荣获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全国民政政策理论研究成果三等奖、全国老龄政策理论研究成果二等奖、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省部级科研奖励10余项，研究成果被民政部、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山东省老龄委采纳应用。

